

●童庆炳 王 宁
●桑思奋 主 编

文化评论

——中国当代文化战略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495302

文化评论

中国当代文化战略

童庆炳 王 宁 桑思奋 主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1 号

责任编辑:邢厚田

封面设计:张 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评论 第一辑:中国当代文化战略/童庆炳等主编.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10

ISBN 7-80100-154-0

I. 文… II. 童… III. 文化事业-方针政策-中国-当代
N. G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5485 号

文 化 评 论

中国当代文化战略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 27 号 邮编 100022)

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mm 1/32 印张 12.5 31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5.90 元

G210

7103

3

392

《文化评论》编委会

名誉主编	钟敬文	何兹全	
主 编	童庆炳	王 宁	桑思奋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一川	王 宁	李运富
	李国英*	李春青*	陶东风*
	桑思奋	黄卓越*	童庆炳

(带*者为常务编委)

刊 首 语

在我国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学术文化也日益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特征。这与新一轮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及学术文化依自身运作逻辑在修补几十年的断裂后日趋成熟等有关,这当然也包括学术与文化的一系列课题的变化,要求人文学者对之作出新的应答,进而也要求改变旧有的表述方式与操作模式等等。总起来看,凡属严肃、有为的知识分子,在此新的学术文化形势与环境面前,既要重新振作自己的责任意识,又要自觉调整自己的工作姿态与工作策略,以便更好地担当起现代学术建设与文化再构的重负,有助于时代的进步。

《文化评论》辑刊即依此思路,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积极筹划、襄助下应运而生的。按照既定的编辑计划,现暂拟年出一刊,每刊为一专号,即有一重点围绕的主题。此外也刊登一批学力深厚的纯学术性论文,及学术批评、文化议论类文章。现出版的第一辑为“中国当代文化战略”专号,约写的主题文章主要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形势下的文化现况作些深入或较深入的探讨,提出各自的建议性意见,或也进行历史反思及世态批评等,以期能引起广大学界同仁对这些重大的时代问题的兴趣和思考。虽然辑刊主持者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办刊主旨,但它仍是开放性的,故希望能得到更多贤能之士们的支持、参与。

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

部分作者简介

黄卓越 浙江临安人。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代表著作《艺术心理范式》等。

马戎 沈阳人。获美国布朗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博士导师。主编《边区开发论著》等。

高丙中 湖北京山人。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做博士后。代表著作《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党圣元 陕西榆村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代表著作《六朝非音》。

王岳川 四川合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著作《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等。

朱志敏 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副教授。发表《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等文 30 余篇。

朱红文 湖南涟源人。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著作有《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

汪晖 江苏扬州人。获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 UCLA 做博士后。代表著作《反抗绝望》、《天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等。

王生平 1981 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研究》常务编委。代表著作有《智慧的碰撞》等。

李春青 北京人。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代表著作有《艺术情感论》、《文学价值学引论》等。

陶东风 浙江温岭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代表著作有《文学史哲学》、《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等。

张海明 云南昆明人。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著作有《经与纬的交结》。

孙 津 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鲁迅文学院副研究员。代表著作有《基督教美学》、《转型的中国》等。

艾晓明 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

目 录

刊首语

重建当代情境

——关于当代文化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 黄卓越(1)

重塑中国的社会主体文化…………… 马 戎(23)

背景主义: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 钱 宏(40)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战略

——追求文化整合还是文化平衡?…………… 高丙中(58)

文化研究的三个超越…………… 陶 钧(64)

当代文化精神构建的现实意义及其儒学资源…………… 党圣元(70)

当代传媒的“后现代”盲点…………… 王岳川(79)

“五四”启蒙辩证法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高力克(95)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

——五四知识分子民主追求中的矛盾取向…………… 朱志敏(111)

现代“科学危机”在二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回声

——重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朱红文(135)

淹没不了的历史足迹

——“现代评论派”的历史及现实文化意义…………… 倪邦文(153)

从孟子到黄宗羲

——论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制衡策略…………… 沈 思(167)

孔子:永远的人类伟人

——《孔子文化大典》代序…………… 孔范今 桑思备(188)

“谁”的思想史?

与艾尔曼教授对话……………汪 晖 艾尔曼(197)

“国学”之反思……………王生平(213)

汪洋,孤岛和小舢舨

——从当代音乐状况看不同文化形态的

异质相间与耦和互动……………韩钟恩(224)

先秦士人阶层的精神特征

——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生成的主体依据……………李春青(243)

庄子人生哲学的超越性结构……………陶东风(263)

魏晋风度的深层意蕴……………张海明(309)

晚明自适说与佛学关系之考辨……………卓 尔(333)

转型期文化情境报告……………金惠敏(364)

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

——读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艾晓明(373)

走出'85* ……………孙 津(379)

文化的复制……………赵宪章(387)

重建当代情境

——关于当代文化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

黄卓越

近些年来，人们普遍所能感到的一点，即是面对与身处的人文景观已非昨比。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基本模式的转化，社会的合理性证实已不再仅仅依于意识形态的辩护，而主要赖于对系统的技术性调节，使意识形态取一种相对避匿的态势，或者说是国家实用主义及相关的实践性操作以替代的方式出现在了历史的前台。其结果是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物质实力的大大加强，共同体个人的生产性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掘等，与此同时，则是基本的经济生活事实带有极大的普泛性，成为意识、欲望所关注的中心，并将一切都推入了其急速旋转的涡流。而这些也必然会强烈地作用于当代文化，并使其由性质至构成均发生了基础性的变故，及由之引起深刻的震荡。由当前文化的主要格局看，变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过去，由于意识形态对各领域的同一性、统摄性要求，不仅对理论思想（当然也包括经济等）领域起着规范的作用，而且承担了对文化的监护权与养育权，而意识形态的相对避匿则使其

放弃了对一定文化的保护,此又恰恰是在所谓的“文化自立”、“文化走向市场”的理论名目下进行的。因此,事实上,不仅是保护特权的放弃,更是有意地将文化推入危机性竞争之中。此中,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有着财政学上的考虑,并体现了整个操作系统转换的特征,但这种如将一切都归于市场机制的实用主义思路,必然使得文化于自身自灭的放逐中面临基于性质上决定了的、无法承受的考验,以致大批原已建立的文化设置、文化社团纷纷涣解,甚至那些担负着重要文化行为的组织为取得必要的生存条件,也只得改换门庭、调整方略,以适应带有明显经济目的的竞争。这样,刚于复苏期发育起来的各层次上的主体文化、探索性文化与经典文化便迎面遭遇着一场巨大劫掠性的沦陷,并失去了于文化言语上对整个民族的导向性地位。

相比之下,在此晦暗的背景上,代之而起的是消费文化的兴盛,其表面的征候是丰富与无序的并存,再加上质素上的低浅性。这种丰富性提供了一个自由感受和自由表述的广阔空间,选择的可能性空前扩大,可看作是文化史上的某种进步。其无序需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予以鉴定。在私人感受的层次上,由于撤除了导向的规定,以更接近于文化自然生成与消费的过程。而在公众生活层面上,无序与丰富的结合便引起了文化言说的杂多,不仅会使众多无意义信息泛滥,造成不必要文化生产的大量过剩,而且因杂多言说之间的不间息竞争,使公共价值无法得到必要的确定,导向性文化无法得以合适的突显,深陷于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澜流之中,进而渗透入个人的心理人格层次,生活的意义遂成为一种随机应变、权宜顺适的选择,加剧了当代社会的人文失范。与之一致的是这种文化质素上的低浅,这当然与生活的及时消费愿望及大众成员由自身原有心理质素出发所作的选择有关,但文化向低浅化的大幅度倾斜,则使得教育、训练、智力及深度精神体验等的价值均遭到怀疑,进而引起对文明过程与文明系统的怀疑(使所谓的“现

代文明进步”完全建立在虚假的框架上),文化的发展反被大规模的低层次上的制作行为与认同心理所支配。消费文化这种汹涌而至的情势造成了当代文化表征繁荣而内在荒芜的局面,替代性满足并未能够掩盖住质实性的空虚。

事实上,由公众领域中出现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于现今所带来的弊端并不单纯限于对文化领域的冲击,而是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从拯救的愿望出发,与“文化自立”、“文化自救”的主张不同,一些人则希望通过经济赎救的策略来改变现状,比如完全出于被迫的文化界的“以商养文”的对策,更主要的想法还是试图援引经济方面的实力,或通过怜悯式的诱导,或借助利润的分享的说服,使其进行文化方面的投入。从偶然的情况看,的确有成功的实例,但从整体上看,却无法解救普遍形成的困扰,曾经而应当是人类精神导师的人文学者只能日益堕落为金钱的乞求者与暴利阶层怜悯者的角色。如果不是引入另一种杠杆,促使公民意识、国家意识在文化态度上作新的调整并付诸一套相应的完整策略,只寄望于来自团体或个人自发性的单纯的经济赎救,那么无论于近期还是将来,都难以看到严峻的局面能得以缓解。

为此,需要对经济活动的本质有一个清晰的分析。就此而言,经济活动必然是以实用主义的以利润创造为核心目标的,这并不意味着对该项活动本身的否认,但却显示了与本位性文化活动以精神为旨归的重大差异。体现在物质形态上,前者是可交易的,后者(仍就本位上言,是无法交易的,而将无法交易者纳入交易的范围内,就必然会丧失其原有的功能,或因其固有的无法交易性而引起滞通,进而废弃。在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以利润为目的的本性,一旦使其面临无法交易的局面,就会在行将无法兑现的可容限上止步。比如,在更多的情况下,投资团体与个人看中的仍是本位文化转变其原有功能之后的可交易的价值,这样,二者的合作由于引入了经济的动机,便不仅无法保护本位文化原有的功能的实现,反

使之商业化、利润化了,援引的资金不是为投资者取得了更多获利的机会,便是造成了消费文化一极的更大增长。从一种角度看,消费文化可看作是本位文化功能转化、变质之后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文化的商品化”,有时二种文化的界限有难以分辨之处,但消费文化在市场社会里尽管具有合理化娱乐的充分理由,却是负担了商品品质的,这使其既不再属本位性文化,也无法替代(甚至是解体着)本位文化的功能。同时,在纯粹市场机制下进行的文化活动,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仍是经济目标,如一些地方政府和商业团体推出的“文化搭台”、“文化促销”等,不仅目的是为了现实的利润,借用文化标签而扩大利润的获取,而且文化也被作着商业的诠释,处于完全隶属的地位,文化的原义已被扭曲或抽取。在经济与文化的自由交涉之中,文化总是脆弱的,坚挺的必然是各种财团,而凡此一切都使文化失去了独立的可能,故此也自然遭致人们对其本位价值的怀疑,即重要的不是文化是否有意义,而是文化是否有其自身独立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化就必然会永远脆弱下去,成为事实上的可有可无者,同时,文化也就永远没法备有自己的目标,并通过按自我原则的组合成为另一种坚挺可靠的力量,永远堕为经济(或别的什么)的依附,进而于人格层面上由于对立的抽取而造就整整一代的“经济人”。

再来检查一下我们“文化人”于目前常常采有的文化姿态。与经济实用主义的观点一致,它不具充分的独立性,而基本上是顺世性的。从现有的文化书写与表述方式看,也包括最有影响力的各种传媒在内,起支配意向的不是一种自立、超越其上的人文目的,而是取得世俗认同的愿望,因而,便是那种力求接近“固有性”或拟想固有性的心理。体现在文体形态上,便主要是描述性的,或者沿顺应固有性方向作进一步的延伸,正是因为固有性本有的弥散化特征,因而描述带来的就是杂多的言语,文化对世界的认知,不再将其作为整体予以把握,也无法坚持以主体际性处理呈示的对象。在

对世界的态度上,文化本来承担着描述与批评二种功能,又以批评的功能为主,并由批评中发展出新的构造,而在顺世性的心理下,批评的一极大为减弱,文化通过对当代现状的言语性弃权,失去了其主体的立场,同时也失去了站在其外的指导者、仲裁者身份,只成了世界经验信息的报告者与传播者,经验状态压倒了理性状态,固有性压倒了超出性,文化主体被作着进一步的消解。由此而言,文化在其基本的思考形式,即其应当与可能立足的地方,始终在作最大努力的退让,从而便于不经思索之中加深了自己原有的危机。

这里,事实上已很明显地引出了文化与世界、即实在性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这种实在性不一定是肉体实在性,也是社会实在性),而所谓的文化目的、文化价值、文化本位意义的提出均与这一关系的良好解决相关。由文化的心理需求看,它从一开始即含有超出实在的企图,同时又是一种楔入的超出。楔入已表明它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抽象性原则而存在,超出则表明它的确立是不满于对实在固有性依附逻辑的升越过程,而意在更高的向度上去构建一种既作为固有性的解放,又进一步可返身制衡现实的新的言述体系。也正是它的超出性品性,使其本位能以成立,并可作为生活形态的更高构体加以观望,取得一种在自身功能范围内不可替代的特权。尽管它可能完全融汇到了不自觉的感受与行为之中,带有着类固有性的特征,然其品性则仍属超出性的。文化的沦陷或者判断沦陷的标准,不在于对其意义侧面的不同选择,而在其本位性的存在与丧失。在当前的情况下,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附性文化的突起,使得刚发育起来的本位性文化遭到排斥,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却已引起了后者于根本上的贬抑。而一旦文化之本位丧失了,由其引申出的多种价值也便无法得以保证,进而便是实用主义、相对主义、顺世主义,在无更高原则制衡或补充下的泛行。因而,振兴的意愿首先便集中在如何使其获取超出性、独立性的品位,并为此提供新的思路与对策。缺乏对此的基本考虑,就无法真实地寻找到重拯

的入口。

文化战略即当是在此思考下的一种抉择。事实上,无论于西方还是中国,能以战略的观念看待、处理文化,均带有着鲜明的当代性。这是因为尽管在传统状态下,几乎任何一种文化行为均包含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策略性),但也只是包含而已,是一种过后理解所赋予的性质,并未备有战略的高度意识。文化行为毕竟是不同于文化战略的,两者的差异如同城市构成活动中一是由建筑学上,另一则是从规划学上的不同考虑。文化行为主要是一种制作性活动,并有可能是为文化,也可能是非文化目的的,它集中考虑的是特种有限对象的制作可能。而文化战略首先的出发点是对文化命运的思考,是基于对自身诸种困境,当然也包括功能性困境的强烈意识,并为力图摆脱此种困境而提出的。从设计的方面言,它是超出一切文化行为之上的一种理性把握,即对将要进行的文化行为作整体组合性、策略性的思考、筹划。而由其整体性视界而言,又需要充分地探索、处置各种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外部要素与条件(如联系社会学、人种学、技术科学等的考察),以便将自己作出合适、合理的定位,并付诸成功的实现。置其于历史的阈域之内,在文化行为即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情况看,战略并非是必需的。这样一种思考模式必然是在文化本身遭到强烈的威胁,文化行为被其他的动机所支配,以致一切具体行为均变得无自身基本的意义,成为可被任意调遣、利用的工具论手段,同时整体的视野又业已得到全面获取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成为思考的对象,并以整体逻辑的方式被提到议程之中。

因此,文化战略这一概念也就充分备有了施行者群体的主体/主动性向,即由文化本位出发的一种独立而前倾的介入,不是冷漠旁观与卑谦顺世,或者依附于事实之上的一种从适皆宜的陶醉,不是“给予”性的,而是“要求”性的,不是沿着固有性路线来调节自身,而是以超出性来制衡固有性,不是单纯描述与释义的,而是批

评与建设的,是在旧模式解体及分立的原素不知所向之后所作的非单纯回归性的、而是立足于创拓的重建。就其作为一种符号性冲动而言,便是企图构造出新的言说形态,于更深的要义上,也就是对新的言说方式发出提请性要求。就其设想的人文品质而言,便是以此重塑那种不同于单纯“经济人”的“文化人”“文化人群”。它不是把握了当代文化的走向就止步不前了,而是要在当前的杂说世界中创造出宽宏的当代文化的另一种走势。同时,既然它依然是战略之时,便不可能就是实在,而是主体际性的“假想性重构”活动,同时又希望能于此预设中诞生出新的实在。

当代中国文化战略是我们在经历一场深刻变故之后,企图重建新的人文秩序的初步设想,但也并非任何关于文化的战略都是基于文化本位之思想的,除以上提及的“文化自救”、“以商养文”等外,又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全球文化战略”等。全球文化战略的思路至今仍不甚清晰,从各方论述看,或是借此而形成世界文化各单元间的汇通体系,或是以民族本位来确立自身文化世界体系中的优胜位置。且不论这一概念的空洞性,就后一种观念看,民族本位是不同于文化本位的,它可能包含有文化本位的意含,也可能是无文化本位意含的,无论怎样,它的意义重心是外指的,即落在与他民族的差异之上,因而便可以各种依附性文化或传统本土文化(两者本身均自有与他民族的差异之处)来充斥它的实义,误使文化的差异性与文化的本位性作绝对的等同,从而丧失对当前文化功能的认真检讨,进而便疏略文化重建应有的使命。而我们关于文化战略所依据的文化本位的概念直接面对的却是当前的现实处境,并于镢入的超出性中欲使其对实在有实践的制衡作用。它无论差异与否,差异本来即存在于本位之构体之中,差异的外部呈现只可看作是其的一种附属效应,而非目的。同时,其与不同文化的交涉,也并非出于差异的需求,仍为返回到对文化本位构建思考的合适性中。因而,主要重在差异的全球文化战略或民族文化战略的

观念实际存有的一个思维误区,仍是工具论地对待文化的必要性,即目的始终是非文化的,而是在深层意识中出于“成就意识形态”的需要。

二

以战略的思路来看待文化的重建,在最近几年中已由人文科学诸领域学者通过对文化现状的省思渐次传达出来,并越益在多种话语的竞争中成为举足轻重的理论意向。它首先是与获得文化的本体地位,即独立提供及评估社会生活权力的构想联系在一起。正如以上已论及的,文化本位的思想至少包含两项基本的说明性要素,即一文化意含的超出性,这无论于私人领域还是公众领域都是一样的;另一是在公众领域中文化意含的相对聚合性,以取得一些基本公认的价值,及依此价值能共同经循的可参照性规定(它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更为广大的区域)。在公众生活领域中,文化的超出性与聚合性是不可分割的,体现为一种可在一定意义上抽象出的同一性原则。当文化对社会固有状态的任意性经验起到了某种整合与制衡的作用,并将此特权贯彻下去而使经验具有相对收聚的方向时,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使社会能于必要的张力中前行。

这种设想很明显是基于现有文化的失衡状况而提出的,尽管失衡主要是由向经济生活事实的强力倾斜引起的,在理论意识上却得到消解主义/实用主义的生活哲学的辩护。因此,需要进一步在当代思想交涉的背景上加以检查,以便使我们的思路获得更清晰、可靠的整理。

当代消解主义与实用主义由思考侧面上看自然有其差异之处,并为此而产生出一些分歧,但两者却仍在一极为重要的向面上达成了默契,即它们都一致反对预设概念,由哲学上讲,实际上也就是预设本体、本质的存在及因预设性、先验性而导致的绝对